

社会改造的共时性实践:融合社会学 真知与社会服务的东方传统

——北京大学—燕京大学社会工作发展的历史传承

熊跃根

(北京大学 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北京 100871;北京大学 社会学系,北京 100871)

[摘要]本文从“共时性”与“共时性实践”概念出发,描述和分析中国社会学与社会工作早期发展的“燕京传统”,这种传统或遗产是建立在社会学真知与服务社会相结合的基础上,对后世的教育和实践无疑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此基础上,回顾和阐释改革开放背景下社会工作专业教育的重建与发展,从制度-事件-组织三个维度来深入洞察中国社会科学重新融入世界体系这一重大转变,以及对社会学和社会工作学科发展带来的强大推动作用。回顾100年来中国社会工作的历史发展,其专业发展可以总结为一种融汇知识与学科发展的东西交汇的历程,即社会工作发展既受到国外发达国家学科知识发展的影响,也融合了本土实践与地方知识,这就使创建融合了自身文化理念与传统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成为新时代的关键行动议程。

[关键词]社会改造;社会服务;知行合一;共时性实践

[中图分类号]C9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353(2025)12-0058-12

一、问题的提出

从历史视角回溯,中国社会工作的发展具有非常独特的经历,其教育先行,实践后发,既是历史的印迹,也是特定时代里制度与文化等综合作用的结果。2025年恰逢燕京大学创办社会工作100周年,这个契机令学界有机会重新回溯和思考,从大学机构的专业教育与社会服务的经验,来认真思考经历一个世纪的中国社会工作发展,探究其不同寻常的发展轨迹和深厚的历史影响。

作为社会科学的一个分支,中国的社会工作脱胎于社会学。从历史到当下,无论是学科发展,还是社会实践,中国的社会工作都与社会学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中国社会工作的先驱人物、已故的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雷洁琼先生曾说,社会工作是“应用的社会学”。长久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强调在国家与社会发展中自身的责任与担当,主张知识与实践二者的结合,即“知行合一”。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把社会学与社会工作二者的关系看作是“知”与“行”的关系,社会学提供理解和分析社会问题的理论、方法以及专门领域(分支社会学)知识,而社会工作则是通过具体的社会参与和社会服务,来应对和解决各种与人(或人群)、社区和不同组织相关的社会问题,正好体现了“知”与“行”的互补和统一。可以说,学科上的整体性和互补性,造就了中国社会学与社会工作发展的历史传统,这也是燕京大学及今天的北京大学社会工作专业发展的历史遗产。

[作者简介]熊跃根(1965—),男,北京大学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研究方向:社会政策、比较福利制度、社会理论。

具有现代性的社会工作,产生于19世纪末工业革命与城市化发展时期,与民间慈善组织活动的发展紧密结合在一起。在英国,社会工作诞生于19世纪60年代工业革命时期的慈善组织会的民间助人实践,社会行政的立法实践则起源于1906—1914年期间的自由改革时期,深受自由主义传统的影响。在美国,社会工作起源于19世纪70年代慈善组织会和进步时代(1890—1920年)专业/职业体系创建之初,深受社会达尔文主义、个人主义与实用主义学说的影响。而在中国,社会工作发端于20世纪20年代动荡不安和社会问题丛生的国民政府时期,一批大学相继开办了社会工作专业。然而,值得重视的是,当时社会工作专业的开办与服务实践的开展,基本上都是在社会学学科发展和建制基础上,社会工作并未与社会学分离。以1922年创立社会学系的燕京大学为例,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本科)和哥伦比亚大学(硕士)的美国传教士步济时(1883—1949)为首任系主任,他对燕京大学社会学学科与社会工作服务的发展,起到了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他致力于发展符合中国本土社会和文化的社会学与社会服务,这与步济时早年在中国以传教士身份体察民情与从事社会服务的经历密不可分。20世纪20至30年代,伴随中国社会学的发展与社会变迁,一大批受过社会学和社会工作教育的毕业生走向社会,投身于救亡救国和报效国家服务社会的大业中。同时,也有一批先进青年开始走出国门,迈向欧美等发达国家留学深造,攻读社会学和社会工作专业的高级学位(硕士和博士),为日后中国社会学的发展和社会服务的开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作为社会学系的首任系主任,步济时从燕大社会学系建系之初就强调,创办社会学系就是要在科学的理论与方法指导下,通过社会服务来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①

从中国大学教育制度和学科发展历史来看,社会学与社会工作二者彼此的关系远比人们想象的要复杂。中国社会工作包括专业教育的发展,反映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变迁与政府职能部门改革的结果,也是在社会变迁和社会问题的背景下政府、大学教育机构、专业团体和实际工作者互构的产物。^②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和促进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新征程背景下,重新认识中国社会工作的既有传统,结合新时代国家治理与社会服务的问题与目标,本文旨在探讨以下几方面问题:第一,经过百年岁月,如何看待中国社会工作早期发展的“燕京传统”,这种传统或遗产建立在社会学真知与服务社会相结合的基础上,对后世的教育和实践无疑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第二,以北京大学为例,分析改革开放背景下社会工作专业教育的重建与发展,从制度—事件—组织三个维度来深入洞察中国社会科学重新融入世界体系这一重大转变,以及对社会学和社会工作学科发展带来的强大推动作用;第三,进入21世纪以来,伴随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的全球化与国际化进程进一步加快,社会工作迎来了专业化与职业化的新浪潮,前所未有开始了职业发展与专业教育标准提升的制度化进程。本文的核心论点是,中国社会工作无论是历史的发展,还是当代的实践,都是在一个开放的社会科学体系和东西知识交汇的基础上的结果,更是一种以社会改造(或社会改革)为目标的共时性实践。同时,以燕京大学和北京大学社会工作专业的历史发展为例,认识中国社会工作发展的知识与行动二者关系,反映了中国知识分子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进程中追寻的“知行合一”的核心价值和目标。在认识社会和解决社会问题,努力践行“从实求知”和“以行求知”的核心理念,它也成为社会工作专业教育与社会服务实践的行动指南。基于对历史发展的分析,本文提出,社会工作的“燕京传统”本质上是一种“共时性实践”。围绕“共时性实践”这一概念,论文将阐述和分析燕京大学社会工作发展过程中真知与实践结合的机理及进路。“共时性”是心理学家卡尔·荣格创立的一个极富原创性的概念,在荣格看来,“共时性”是一种有意义的巧合,它指两种或多种事件之间,以一种非因果性的方式相互关联,包括心理状态、外部事件与意义。“共时性”现

①齐钊:《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社会工作本土化的特色与经验》,《社会建设》,2022年第2期。

②王思斌:《中国社会工作的经验与发展》,《中国社会科学》,1995年第2期;王思斌,阮曾媛琪:《和谐社会建设背景下中国社会工作的发展》,《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5期。

象表明,人类的智识活动与外部世界并不是相互分离的,它们可能在更高的层面上相互联系与相互作用。

二、社会改造的共时性实践:社会学真知与社会服务相结合的燕京传统

在中国高等教育历史上,创立于1898年的京师大学堂(后改为北京大学)和1919年创建的燕京大学是两所具有极其重要影响的大学。北京大学一直以来都在专业教育、科学研究、社会改造和国家发展等方面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而燕京大学则在短短的三十多年办学时间里取得了辉煌的成果,对中国近代教育、中西文化交流(尤其是中美学术交流与合作)和倡导社会改造等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教会在中国开办了多所学院。为了更好地整合资源,提升办学水平,在美国传教士司徒雷登的多方奔走和协调下,汇文大学、华北协和大学等在1919年正式合并,成立了“燕京大学”(英文名为Yen-Ching University)。作为一所文理综合的高等院校,从创立起就以追求真理和服务社会为理念,“知”(追求真理)与“行”(服务社会)为办学宗旨。

从思想源头来看,“社会改造”在欧洲尤其是在19世纪下半叶英国工业革命晚期有清晰的发展轨迹,与基督教社会主义者及后来的费边社成员关注英国劳工权利与弱势人群的救助有直接联系。燕京大学成立于1919年,三年后燕大社会学系建立。1922年至1931年这10年左右可以看作中国早期社会学的建设期,也是社会学在中国成长比较迅速的一个阶段,它被称为“燕京大学学派早期”。

1. 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的办学理念与专业课程体系

1922年,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深受美国社会福音思想和芝加哥学派实证社会学的影响的约翰·斯图尔特·伯吉斯(中文名为“步济时”),受邀出任燕京大学社会学系首任系主任(1922—1926)。他创立社会学系的初衷,是为了系统训练社会服务人才,用于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这与曾执教于芝加哥大学、并在1919—1921年期间在中国巡回讲学的美国哲学家和教育家约翰·杜威(1859—1952)所倡导的实用主义不谋而合。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的创办和注重本地社会调查及社会服务的传统,与首任系主任步济时密不可分。作为燕大社会学系的重要奠基人,步济时的办学理念深刻影响了中国早期社会工作教育的走向。步济时极力注重社会调查,强调通过实践服务社会,同时推动社会服务与本土社会紧密结合起来。

在燕京大学社会学创办早期,步济时是先行者和奠基人。在开办社会学系期间,步济时非常注重社会调查。在课程学习上,步济时强调科学调查先行,他认为只有通过系统的社会调查,才能理解中国真实的社会问题,从而为社会服务提供科学依据。在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开办初期,只有步济时一位专任教师和5位兼职教师,但却开设了宗教学、社会工作、社会调查等10多门课程。1925年,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更名为社会学与社会服务学系,同时增设社会服务短期科,开设了个案工作、团体工作、社会行政、精神健康社会工作、社会福利等课程。燕京大学举办的社会工作课程和人才训练模式,反映了中国早期社会工作教育的理念与内容深受美国大学与基督教传统的影响。^①在燕京大学社会工作开办过程中,步济时强调社会学系要注重培养能够解决实际社会问题的服务人才,而非单纯培养学者。因此,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在课程设置中特别设置了实习课,并规定了相应的学时数,这在社会工作教育史上是一个先例。博士毕业于美国爱荷华大学的许仕廉(1896—1981)将社会学学科进一步制度化和本土化,他于

^①胡杰蓉:《教会大学与早期中国社会工作教育——以燕京大学为个案》,王思斌编:《中国社会工作研究》(第七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193—227页。

1924年担任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并在1926年至1930年期间担任燕京大学社会学与社会服务学系主任。作为一名华人教授和首任华人系主任,许仕廉对一所中国大学社会学系的开办与发展之重要性不言而喻。加入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后,他将国外的社会学理论、方法与本土教育结合起来,即如何在社会改造实践中融合西方先进的科学知识与中国的文化及人文精神。作为一位卓越的组织者和学术建设者,许仕廉于1927年创办了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的学术刊物《社会学界》,该刊成为中国早期社会学界最重要的学术阵地之一,极大地推动了学术交流与研究。在社会学人才培养方面,根据燕京大学的相关史料记载,1922—1932年期间社会学系(1925年改为社会学与社会服务学系)共有本科毕业生80人,硕士生12人。许仕廉除大力培养社会学和社会工作人才外,还积极引进社会学和社会工作专业教师。雷洁琼先生早年在美国南加州大学攻读社会学硕士学位,1931年毕业后被许仕廉引进燕京大学社会学与社会服务学系任教,雷先生常年在家庭社会学、儿童和妇女领域从事教学和研究,做出了一批有影响力的成果。雷洁琼先生多年在燕大社会学系的教育、研究与实践,成为当代中国社会工作教育与实践发展的一个重要的精神财富。^①毋庸置疑,一个国家大学人才的培养之目标,首先是使毕业生服务自己的国家和社会,也符合中国人一贯主张的报国情怀。考虑到中国是一个人口中农民占多数的国家以及农村发展的重要性,20世纪30年代初燕京大学社会学系还专门开设了农村社会学、中国农村运动等课程,在课程基础上,派学生到河北定县、山东汶上及河北昌平县(今北京昌平区)清河等不同农村地区实习,参与地方的乡村服务与改造,通过社会调查与服务促进乡村建设与发展。从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当年的课程设置与学生培养模式可以看出,它将社会学理论与社会改造的服务实践紧密结合在一起。始终坚持学术中国化与本土化的原则,突出人才培养为社会服务的实践导向,反映了那个时代国家命运与大学使命的高度契合,以及知识分子致力于社会改造的理性与实践方略。

2. 田野调查与社会服务相结合的共时性实践:以“清河试验”为例

20世纪20至40年代,中国饱受动荡与战争之苦,然而救亡图存和科学救国的抱负却激励了一代又一代中国知识分子与有志之士。期间社会学和社会工作学科与实践的快速发展,既反映了中国大学教育者力图通过教育和人才培养来改变社会的愿景与努力,也映衬了那个时代国家建构与社会科学知识全球传播在中国的影响。借助社会学的理论知识、方法和经验调查,1926年许仕廉接替步济时担任燕大社会学与社会服务学系主任。在许仕廉的领导下,燕京大学的社会工作教育致力于培养解决社会问题和服务社会的专业人才,在儿童、流动人口、妇女和社区等各个领域开展了深入细致的调查和社会服务,在北京海淀的树村开展了识字教育、健康倡导和帮扶服务,在海淀开展了以社区改造为基础的著名的“清河试验”。从历史文献和记录来看,许仕廉是推动“社会学中国化”运动早期倡导者和实践者,也是“清河试验”的主要发起人和组织者。在燕京大学社会学开办早期,以步济时、许仕廉、杨开道等人倡导的社会调查和经验研究,奠定了燕京社会学派的重要基础。^②同时,与纯粹只关注学术问题和社区研究的学者不同,步济时和许仕廉都认为只认识和研究中国社会是不够的,还要通过社会服务来改变社会贫弱人士的境遇,从而促进社会变迁。理解那个时代大学的发展与知识分子参与社会改造实践,必须将中国现代国家的建构进程与知识人匹夫有责的家国情怀联系在一起。五四运动以来,在中国知识分子眼里,社会改造既是一种推进现代国家发展的政治议程,也是一种实际赋予地方与基层社区自主性发展的具体行动,通过社区教育、社区服务与社区自治的不同策略,在脆弱的国家能力外注入一股社会发展的新活力。与此同时,在20世纪20至40年代,中国国家能力的建构与社会力量的发展,一方面反映了西方冲击——中国回应的一种现实处境,另一方面更可以看作是中国社会内部一种民族主义精神与“中

^①雷洁琼,水世铮:《燕京大学社会服务工作三十年》,《中国社会工作》,1998年第4期。

^②傅春晖:《早期燕京社会学的人文区位学研究——以杨庆堃的〈邹平市集之研究〉为例》,《社会学评论》,2021年第5期。

国性”(Chineseness)在经世济民与救国图强这一远大进程中的呈现。总体而言,它们是通过大学与知识分子在一系列社会改造行动议程中呈现出主体性与能动性。理解近代中国以来的历史发展进程,尤其是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的发展历史,研究者尤其应注意到中国与中国人作为论述的中心以及参与国家建构进程中知识分子对社会改造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即美国汉学家孔飞力曾强调的现代中国历史进程中的“内部叙事”。^①

由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推动的“清河试验”,是中国社会学史和乡村建设运动中一次极具影响和代表性的社区研究与社会改造的实践。它不仅被视为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在学术发展上的一个高峰(形成早期燕京社会学派),推动了以社区调查为基础的社会研究与理论总结,而且是中国早期社会工作专业化本土实践的一次深入探索。毫无疑问,“清河试验”是在社会调查与学术研究基础上,在乡村层面上进行的一次较大规模的社会改造实践。不同于单纯的学术调查与研究,20世纪20至30年代由一批中国知识分子发起的乡村建设运动(包括清河试验),实际上也是学术人重返社会,尝试进行制度变革与改造的一种政治实践。^②1928年燕大社会学系获得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2000美元的资助,时任社会学系主任许仕廉等人提出,对一个特定地区进行定量分析可能会更有价值,更能产生有针对性的社会改造案例。基于此,由燕大社会学系许仕廉教授任主席,留美博士、农村社会学专家杨开道为秘书和实际调查指导者,调查为期两年(1928—1930),涵盖清河方圆200公里的40个村,涉及两万多农民。^③1928年冬,杨开道带领学生在北京西北郊清河镇进行系统的社会调查,调查内容主要涵盖人口、家庭、经济等。与此同时,在调查基础上,还要从经济、教育、卫生与医疗等多方面针对农村存在的问题进行治理。他认为农村社会学不仅是理论科学,更应是应用于农村社会改造的应用科学。杨开道主张理论研究与实地调查相结合,目的是通过科学方法研究中国农村,达到改造农村组织、增进农人生活的目标。1930年,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正式建立“清河社会试验区”。燕京大学社会学系针对清河试验项目,专门设立了调查研究、农村卫生、农村服务和农村经济四股。在许仕廉的支持和安排下,张鸿钧深入参与了“清河试验”和华北农村建设运动。他是中国最早系统提出并实践“综合社区发展”模式的学者之一,有效吸收了西方社会学和社会工作的理论,紧密结合中国乡土社会的实际情况,致力于探索一条社区发展的本土化道路。“清河试验”凸显了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主张的社会学理论与社会改造实践相结合的宗旨,参与社会调查的诸多师生,也是在践行服务民众和社区发展的理念,其中一个很具代表性的例子就是燕京大学社会学系1930级本科生蒋旨昂在清河试验区所做的、为期一年的社区调查和社会服务,他与调查所在地河北省昌平县卢家村的村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是典型的社会工作实习和服务,最后写成的调查报告《卢家村》发表在1934年出版的《社会学界》第8卷上。在这篇详尽的社区研究报告中,蒋旨昂清晰描述了卢家村的地理、人口、家庭、经济、政治、宗教与教育等方面的内容,尤其关注了儿童与成年人的教育问题,对开展社区服务与社会改造具有重要意义,也成为考察与分析当下华北农村社区状况与服务干预的一份重要参考史料。^④在《社会工作导论》一书中,蒋旨昂提出,社会工作作为一种过程,应通过各种社会力量,通过人的参与和互动,依赖社会服务和社会行政为主的途径进而实现人的社会化人格。^⑤即使在今天,这种观点与判断仍然具有重要价值。

需要指出的是,20世纪30年代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及其之后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与社会学芝加哥

①[美]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林同奇译,北京:社科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327—328页;[美]孔飞力:《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陈兼、陈之宏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版,中文版序言第3页。

②游海华:《近百年以来中国农村建设考察》,《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期。

③赵晓阳:《寻找中国社会生活史之途:以燕大社会调查为例》,《南京社会科学》,2016年第2期。

④蒋旨昂:《卢家村》,《社会学界》,1934年第8卷。

⑤蒋旨昂:《社会工作导论》,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12年版,第16页。

学派的领军人物罗伯特·派克密不可分,在社会学研究上明显受到了社区研究与人文区位学方法的影响。1932年派克应许仕廉之邀访问燕京大学并为社会学系学生开设了两门课,一门课是《集体行为》,另一门为《社会学研究方法》。燕大社会学会将派克的论文与社会学系师生的论文一同结集并以《派克社会学论文集》公开发表。在《论中国》一文中,派克指出,中国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文明复合体,其挑战在于如何塑造成一个政治的个体,能集体地有效运作。在派克看来,一个民族的将来取决于青年。而且,还要通过有效的政策与国家能力来实现发展目标。^①在某种程度上,20世纪30年代燕大社会学系推动的“清河试验”就是一种通过青年参与的知识与实践,进行社会改造与健全国家治理能力的尝试。作为一个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国家,中国社会自晚清以来长期饱受内乱外扰的侵袭,国家能力孱弱,乡村社会孤立而蒙昧,自私多过利他,松散胜于团结。中国社会的改造是现代化进程的一条必由之路,然而如何将这样一个文明古国从永久的历史中拯救出来,如何将现代文明理念与先进技术融进地方发展的进程中,并无固有良策。基于此,燕京大学推动的“清河试验”就是要通过利用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知识,结合乡村基层农民阶层的心理、生活现状与农村社区改造发展的实际需求,通过教育、发动、自我觉醒与参与,从民心与民权等维度来切实改变落后的面貌,进而逐渐达到强民富国的长远目标。

在今天,针对“清河试验”众多的社会学研究者,更多关注的是其学术机理和研究方法等的贡献,很容易忽视了当年燕大社会学系师生深入投入乡村调查和社区研究背后的初衷,即奔赴农村基层社会绝不是为纯粹的学术和获得一般知识,更重要的是改造农村和复兴农村。^②在20世纪30年代,乡村建设运动在中国华北、华东、华南、西南等地都建立了地方的协会和网络,其中又以燕大的“清河试验”较为突出,有效融合了社会学理论与方法,尤其是有效融合了知识与改造社会的具体服务,注重社区发展与农民的参与,是一种典型的“共时性的实践”。正如曾在当年主持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定县试验区调查部主任的李景汉先生曾主张的那样,社会调查要特别注重应用,而不要纯为研究学理、求得知识,不能只为调查而调查,不举行调查则已,举行调查必须有一个清楚的目的和宗旨,使人们根据调查的结果来改善社会实际生活,解决社会问题,增进人类幸福。追求真理与自由,关心国家大事,胸怀社会与民众需要,通过科学知识来服务大众,进而改造社会,实现国富民强,是燕京大学社会学与社会服务学系创立以来,通过数代人的卓绝努力锻造的“从实求知”与“以行求知”相结合的“燕京传统”。从1922年燕大社会学系建立,经过十多年的发展,到20世纪30年代末,燕京大学已涌现出一批在国际社会学(人类学)界著名的学者,是欧美社会学之外的一个繁荣之地。^③

三、服务国家的共时性实践:改革开放后北京大学社会工作的重建与发展

北京大学自建立起一直注重国学与西学并举,中西交融。19世纪中期以来清代的国家—社会关系变化,尤其是国家职能的变更和民间社会的纷乱,成为考察“中国现代国家”的一个重要线索。晚清帝制的衰落,不仅仅是一个朝代的孱弱,更可能预示着作为一种东亚文明的中华文明之衰落。怀抱救国图存的知识分子和仁人志士,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和“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奋斗目标。在强国和民族复兴的号角下,国家的现代性进程不再是一个抽象意义上的宏大议程,而是与帝国决策者、官僚、知识分

^①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编:《社区与功能—派克、布朗社会学论文集及学记》,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7—21页。

^②侯俊丹:《制度变迁下的知识治理:早期燕京学派的清河试验》,《学海》,2017年第5期;侯俊丹:《市场、乡镇与区域:早期燕京学派的现代中国想象——反思清河调查与清河试验(1928—1937)》,《社会学研究》,2018年第3期。

^③Freedman, M., “Sociology in China: A Brief Survey”, *The China Quarterly*, 1962, 10, pp. 166—173.

子和民众等不同程度参与社会的地方议程紧密结合在一起。^①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引介新学科和新学问,强化治国的知识和方略,成为仁人志士的一种共识和行动。作为中国第一位近代思想家和北京大学首任校长,严复充分认识到国家富强,不能仅仅依靠学习新技术(洋务运动)和制度变革(戊戌变法),而应该“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要从根本上改造国民性。而社会学正是研究社会变迁和塑造国民性的学问。要了解西方先进思想和技术,必须系统认识和理解相关的知识和学问,而不能急于求成和失去严谨的科学精神。基于此,严复将英国社会学鼻祖赫伯特·斯宾塞的《社会学研究》引入中国,翻译全书并取名为《群学肄言》,该书于1908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群学肄言》的出版,标志着中国社会学学科建立的一个重要起点,“群学”也成为当代中国社会学界理解社会学的内涵与文化意义的核心概念支撑。从某种程度上说,中国社会学的发端,与早期北大一批学人引入西学和翻译西方学术著作,以及在一个国家面临生死存亡时刻将社会变革(改造社会)带入时代的新思想密不可分。五四运动后,中国在某种程度上迈入了一个追求新思想、新风气和新实践的时代,反帝反封建和爱国民主进步,成为青年学生与知识分子的社会理想,而呼吁通过增强个人的自由而积极投入社会,以社会主义代替国家主义,以“社会改造”的实践来强国强民,成为这个时代的一个强音。^②

1949年新中国成立,高等教育与学科发展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受苏联模式的影响,1952年中国的高等教育与社会科学发展一度遭遇停滞,社会学、社会工作等被贴上资产阶级学科标签的专业在大学一律被取消,诸多大学被合并,包括燕京大学在内的教会大学终止办学或与其他高校合并,原北京大学迁入燕京大学所在地,燕京大学原有系科被拆分并合并到不同高校。1977年中国恢复高考制度,中国高等教育开始迈入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伴随着经济建设和社会变迁,人文与社会科学在大学得到有力恢复和发展。经济建设和社会转型带来了大量新的、复杂的社会问题,国家需要一门可以“认识社会、管理社会、规划社会”的学科,为党和政府的决策提供依据。尤为重要的是,1979年春节,时任领导人的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务虚会上明确指出:“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以及世界政治的研究,我们过去多年忽视了,现在也需要赶快补课。”这一指示成为中国社会学学科恢复的尚方宝剑,为日后社会学的发展和社会工作的恢复提供了最高层面的官方依据。改革开放使中国国门开始打开,中国与国际学术界的交流日益频繁,中国政府每年派出大批的出国留学生和交换学者,到欧美发达国家学习科学技术和人文社会科学。社会学在中国大学和研究机构的缺失,使得中国学术界很难与国际同行进行交流并融入国际学术界,这一学科的恢复迫在眉睫。理解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国社会学学科的恢复与发展这一历史进程,本质上也是理解当代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国社会学的中断与重建及发展,反映了社会变迁的历史进程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转向。20世纪80年代,知识分子和治国者针对富民强国的发展目标与政策选择的共识,促进了一个共时性的社会变革与经济繁荣时代的到来。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现代化”成为社会学理论一个重要主题,也预示着“现代化与发展”范式的改变,在非欧洲传统或广大的发展中国家,“传统”的维系和再造与社会自身出现的结构性变化与新技术的涌现,极大地改变了民族国家在发展模式与道路上的选择。^③毫无疑问,中国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国走上了一条既别于西方社会,也不同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道路,这是历史之必然,某种程度上也是强大的中国传统文化基因的力量。

1. 北京大学在社会学恢复与重建中的领头羊作用

1979年3月,由费孝通、雷洁琼、王康等老一辈社会学家牵头,筹备和恢复了社会学学术组织“中国

①[美]孔飞力:《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陈兼、陈之宏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版,第103—120页。

②刘集林:《“社会改造”与“改造社会”》,《广东社会科学》,2012年第4期。

③Eisenstadt, S. N., “Studies of Modernization and Sociological Theory”, *History and Theory*, 1974, 13(3), pp. 225—252.

社会学研究会”,后更名为“中国社会学会”。为了培养社会学人才,大学急需一批具有专业素养和能力的社会学师资,在费孝通先生等的积极倡议下,“中国社会学会研究会”分别在1980年和1981年在北京连续举办了两期社会学暑期讲习班,邀请海外华人社会学家为学员授课,来自全国各院校的教师和研究者多为哲学、历史学 and 经济学等领域的中青年骨干。与此同时,在高等院校,社会学逐步得到恢复和重建。1980年8月,在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所长的费孝通和在北大国际政治系任教的雷洁琼的不懈努力下,北京大学致函教育部获得批准,暂设社会学专业于国际政治系下。1982年4月,校长办公室会议讨论决定正式成立北京大学社会学系,袁方教授任系主任。1983年,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招收了自学科恢复以来第一届社会学本科生,1985年开始招收博士研究生。北京大学也是改革开放以后国内最早招收社会学专业博士研究生的高等院校。1984年,费孝通先生离开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在北京大学成立社会学研究所并担任第一届所长。1986年10月,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又与新成立的北京大学社会学研究所(1992年更名为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联合申请,于1987年正式建立社会学博士后流动站,是全国哲学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第一个博士后流动站。自此,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开启了培养人才、服务社会和促进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征程,而费孝通、雷洁琼、袁方等老一辈社会学家成为学系的领导者与开创者。同时,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成为中国社会学教学与研究的重镇,也是培训社会学人才,服务社会和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时代先锋。

作为中国社会学最早的发源地,北京大学在引入与传播社会学思想和学说方面,毫无疑问扮演了领导者的角色,这种敢为人先的精神和具备全球视野的学术判断,成为20世纪80年代中国社会学重建与发展进程的重要力量,也是社会学人一代又一代薪火相传的结果。学者与知识分子的家国情怀与经世济民的报国理念,在时代浪潮中再次展示了敏锐的问题意识与学科发展动力。

2. 服务国家的应用社会学:北京大学社会工作的重建与发展

伴随社会学的恢复与重建,与社会学密切相关的“社会工作”作为一门学科和专业,也开始逐步复苏。1983年1月,雷洁琼在为民政部干部所作的培训讲话中指出,北大将来可能成立社会工作系,或者在社会系下设社会工作专业。无论是从历史,还是从现实中看,社会工作都与社会学息息相关,二者紧密联系在一起。对于社会学的发展和使命,费孝通曾提出,“我们的社会学不是为写文章而写文章的社会学,而是为建设服务的社会学”。^① 伴随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进程,中国的人口流动、城乡差距、企业改制、老龄化等问题逐渐涌现,社会管理与社区服务面临的体制与机制问题日益突出,社会学及其应用学科的实践也日益受到关注。如同社会学一样,社会工作专业的恢复和建立,也是在改革开放背景下经济发展和社会变迁的进程中高等教育发展的产物。1985年5月,《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发布,文件明确提出要改变高等教育科类比例不合理的状况,加强财经、政法、管理等薄弱系科和专业的发展。此后,中国高等院校关于学科专业调整的讨论与研究迅速被提上议事日程。1985年12月,国家教育委员会(现教育部)在广州召开高等学校社会学学科专业调整论证会,会上参会者对新专业的名称有不同看法。雷洁琼、袁方和何肇发等老一辈社会学家力主设立社会工作专业,经会议讨论与协商最终确定采纳“社会工作与管理”的专业名称。后经过征求各方意见后,正式公布实施。1987年,民政部成立社会工作教育研究中心,时任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主任的袁方先生任副主任。同年9月,民政部在北京市马甸桥附近的北京对外经济交流中心大厦召开“社会工作教育发展论证会”(即业界简称的马甸会议)。马甸会议重新确认了社会工作专业的学科地位,为社会工作专业教育的恢复与发展奠定了基础。理解中国改革开放早期社会学的重建与社会服务实践的制度基础,是认识社会工作作为一门学科和专业恢复与发展的重要前提。众所周知,作为主管社会事务的职能机构,民政部一直是中国社会福利

^①《费孝通全集》(第十一卷),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87页。

与社会事业发展的核心部门,它对困难群体的社会救助、基层社区管理与针对居民的日常服务,对稳定社会秩序与促进社会发展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流动、国有企业改革与市场经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为城市社会福利服务与社区管理提出了新的课题与挑战,也催生了民政部门从内向外的政策改革,即“社会福利社会化”,增进社会力量的参与、加快社会工作专业的发展和促进社会服务专业人才的培养,通过上述途径实现民政服务与管理的现代化与专业化。基于此,依靠大学尤其是在北京的重点大学及其相关学科,通过建立与大学的合作伙伴关系,是推进民政事业与社会工作专业化的必由之路。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学与社会工作的重建和发展,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与制度变革的需要,也是众多学界知识分子将所学服务国家现代化发展任务的愿望与共识,它通过长期的沟通与合作,发展成为一种制度化的“共时性实践”,即学者们广泛而深入参与国家参政议程和制度建构进程。通过学术团体的学术会议、研究课题的科学研究成果、专业领域的国际学术交流系列活动,推进社会工作的专业化与本土化的发展,而本土化则不断强调中国作为一个具有东方文化传统和制度异质性国家,在发展社会工作时的文化敏感性。正是在雷洁琼先生和袁方先生等老一辈社会学家的认真筹划与积极努力下,1988年初北京大学获国家教委批准开办“社会工作与管理”四年制本科专业,成为最早恢复开设社会工作专业的内地高等院校之一。同时,为了加快培养社会工作专业人才,民政部出资100万元给北大社会学系用于培养社会工作与管理的硕士研究生,这也充分体现了北大社会学系在专业建设与发展中服务国家和社会的理念和实践,开创了一个大学与政府职能部门深度合作的先例。依托社会学系,北京大学社会工作专业发展得益于开放的人文与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同时与境外和国外学术界建立了密切的交流。为推进社会工作专业发展,从1988年开始,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与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建立了长期深入的学术合作关系,为日后中国内地社会工作教育的整体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从20世纪80年代起,如同社会学一样,社会工作学科的发展,也是在一个锐意进取和积极学习国外先进知识与经验背景下逐步推进的。一方面社会工作教育的发展离不开中国本土的经验(如民政部门长久的社会福利与服务实践经验),另一方面社会工作专业本身来自国外,作为一个新学科和新专业,它在中国的发展也须借鉴国际的知识体系与专业标准,上述二者的交融与相互嵌入,促成了中国社会工作课程体系、实践方法、研究旨趣和职业标准等的建立。1991年7月中国社会工作协会成立,这是官方最重要的社会工作行业协会,是一个全国性的专业社会团体(2015年更名为中国社会工作联合会,是国际社会工作者联合会的正式成员),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主任袁方先生担任协会副会长。20世纪90年代后,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进入了一个快速变迁的时代,在市场经济浪潮和巨大的社会变迁背景下,高等院校也面临诸多挑战与变革,一大批高等院校开设设立社会工作专业,中国社会工作也逐渐形成自身的发展模式与经验。^①1994年12月,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在北京成立,雷洁琼先生担任名誉会长,袁方先生担任首任会长。在随后的十多年里,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成为专业教育的重要规划者与组织者,而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作为协会的会长与秘书处所在单位,一直发挥着核心的领头羊角色。2002年协会主编并出版学术集刊《中国社会工作研究》,标志着中国社会工作研究进入新的阶段。20世纪90年代尤其是进入21世纪后,社会工作教学、实践与研究三位一体的综合发展,对高等院校课程体系、师资队伍规模和专业水平、专业实习的制度化安排与学生就业岗位的拓展提出了新的要求,培育学生的专

^①Zhang, H. "China's Social Work Education: Challenges and Issues", *Asia-Pacific Journal of Social Work and Development*, 1991, 1(1), pp. 96-100; 王思斌:《中国社会工作的经验与发展》,《中国社会科学》,1995年第2期;袁方:《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及其面临的转变》,《中国社会工作》,1997年第1期。

业能力成为社会工作教育的核心。^①中国社会工作专业教育的迅速发展,固然与专业共同体建设与院校的努力分不开,但也离不开香港地区高等院校和凯瑟克基金会(香港)对内地社会工作教育发展的大力资助和帮助。得益于凯瑟克基金会(香港)长达20多年(2001—2025年)的鼎力支持,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和会员单位(高校社会工作院系)在师资队伍、课程体系、专业实习与督导、学术会议和国际交流、实践研究等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体现了基于信任和互惠的长期合作伙伴关系。作为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秘书处所在地和会长单位,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社会工作教育发展一直处在全国的前列,在专业教学和科学研究等方面发挥着领头羊的作用。同时,中国内地社会工作的发展,除了受益于欧美国家高等院校及国际社会工作组织的交流与支持外,也离不开多年来香港与中国台湾地区社会工作界的支持与帮助。其中,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后开始,香港理工大学对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开办与发展社会工作专业给予长期的支持,建立了在教学、研究与社会服务多方面的深入合作,在推动社会工作本土化过程中形成了长期的合作伙伴关系。如果说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社会学的主要发展任务是学科恢复与院校发展,在此基础上回应经济改革与发展的社会需要。然而,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国社会学的进一步拓展及其实践应用问题,成为市场经济快速发展时期的主要任务。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加快了社会保障的政策试点与制度改革进程,到21世纪前后一些重要的制度变革基本初见成效,包括高等教育的政策变革、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都为社会工作专业的深入发展创造了条件。

进入21世纪,中国迎来了社会工作快速发展的新机遇。2001年12月,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中国对外开放迈入新的历史阶段,国家进入快速发展的全球化时代。为拓展国际贸易和促进外向的经济发展,中国自主加强向发达经济体的政策学习,积极与发达国家进行各种管理与专业制度接轨,学习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和实践做法,从体制与机制两方面借鉴发达国家的专业发展与职业制度变得十分必要。2006年12月民政部成立“全国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评价专家委员会”,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会长、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王思斌教授当选为副主任委员。基于此,民政部开始筹划社会工作职业资格标准、考核和认定办法等一系列基础制度,并在2008年6月举行了全国首批助理社会工作者和社会工作者的资格考试,自此中国社会工作职业化和专业化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基于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与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合作开办了多年的社会工作文学硕士项目经验,加之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北京大学率先提出要开办社会工作专业硕士项目。从2008年开始,教育部与国务院学位办联合北京大学论证社会工作硕士项目,举办过多次研讨和论证会,形成了较为成熟的办学与项目实施方案。2009年北京大学等31所高等院校等被批准开设社会工作硕士专业,从此社会工作专业教育迈入一个新的阶段,这一高级专业学位的开设,是服务国家大力发展社会工作人才队伍的战略需要,也是对国家专业人才培养和职业化制度建设的有力推进。在这一过程中,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始终勇毅前行,站在先行者和领头羊的位置,为社会工作的创新发展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在全球化时代里,知识、技术与文化的传输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经济增长,也对专业制度的推进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正如202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乔尔·莫克尔所说,除了地理、人口等因素外,正是观念、技术以及正式制度的变革对英国工业化时期的经济增长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同时,思想市场的开放和发展,有用知识的学习和使用,同样对一个国家的繁荣必不可少。^②社会工作作为一门助人的学科与专业,

^①Xiong, Y. G. and Wang, S. B., “Development of Social Work Education in China in the Context of New Policy Initiatives: Issues and Challenges”, *Social Work Education*, 2007, 26(6), pp. 560—572.

^②[美]乔尔·莫克尔:《启蒙经济:英国经济史新论》,曾鑫、熊跃根译,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20年版,第1页;[美]乔尔·莫克尔:《增长的文化:现代经济的起源》,胡思捷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317页。

在全球化时代的中国,同样需要通过东西方文化的融合,将观念与制度变革引入专业的发展,在建立专业标准的同时,注重文化特殊性和多样性的现实环境。基于此,北京大学在发展社会工作专业的进程中,充分考虑到专业化与本土化的关系,不断强调东西文化在理论与实践中的融合,并透过政策与制度的改革推进专业服务的发展。

在中国,社会科学发展具有自身的特点和制度基础,虽然人们对学科分类和专业标准并非完全能达成共识。但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是,社会工作作为一个学科,其专业性和自主性并不一定与其二级学科的地位直接相关。同时,社会学与社会工作的融合发展,是一种基于社会基础与专业实践需要的理性考虑。虽然,在业界,还是一直存在一种声音,认为社会工作应该从社会学母体中独立出来,成立独立的院系,以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然而,从既存的现实来看,大多数社会工作专业还是保留在社会学院系或者公共管理学院的建制下,社会工作与社会学、公共管理、心理学等学科保持了紧密的联系。这种学科的互补性和互惠性,对一个学术和实践基础相对薄弱的专业来说,也许并非坏事,反而是一件有益的事情。换句话说,在高等教育界,社会工作教育和专业的大力发展,并不总是取决于其自身拥有或附着的科层制度等级,而主要取决于专业教育和科学研究的质量。在职业与就业市场,社会工作毕业生的待遇与岗位匹配度也主要取决于学生的学术训练和解决问题的实践能力的专门性。从燕京大学社会工作教育开办的早期历史,到今天北京大学社会工作教育的开展,一个多世纪以来,求知求真,服务社会,兼容并蓄,崇尚科学与民主,爱国进步,从实求知和以行求知,已经成为这所教育重镇的历史传统。强调服务社会,注重制度和政策发展,服务国家战略需要,通过高质量的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来提升专业或学科的影响力,已经成为北京大学学系同仁的共识。在北京大学,开办社会工作一直被视为促进知识增长,拓展人才培养和增进服务国家发展战略需要的一种责任,也是社会发展和大学教育基本精神的体现。从人才的培养角度出发,在一个技术变化迅速和社会变迁复杂的时代里,作为教育者的我们在今天依然应清醒认识到,专业化或学科的细分并不总是能够如愿以偿实现自身的目标,相反它可能限制一个学科的发展空间和判断力。正如伊曼纽尔·沃勒斯坦 20 多年前曾呼吁的那样,“开放的社会科学”不仅仅是强调跨学科合作,而是要从本体论和方法论等角度来重新审视知识生产的机制和理论传统的文明视角。^① 因此,在今天这个时代,社会工作的发展离不开其他社会科学知识系统与实践的支持,作为一门应用的社会学,它依然是在社会发展与服务国家进程中的一种共时性的实践。

结论与讨论

在中国,社会工作在伦理与实践两方面都有深厚的儒家文化传统,同时也注重吸收国外先进知识与理念,始终强调从本土文化与具体情境出发,通过扶贫济困与社区发展来推行社会服务,并在此基础上通过制度与政策变革促进国家与社会发展。本文试图从燕京大学与北京大学社会学发展的历史线索出发,探究燕京社会学传统与北京大学社会学教育的深厚历史,对这一社会工作学科与实践的影响与意义。基于百年社会工作发展的历史,社会学燕京学派与北京大学兼容并包地对社会工作学科与实践发展都产生了深厚影响,这种影响对理解今天社会学与社会工作的发展依然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基于北京大学与燕京大学的继替交融的历史发展,通过北京大学社会工作的恢复与重建,阐述和分析中国社会工作学科恢复和发展的制度背景与重大事件,进而深入理解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学恢复与重建对社会工作专业恢复与重建的重要贡献。笔者在文中提出,过去一百年来,无论是燕京大学还是今天的北京大学,社会工作的发展本质上是一种社会改造(变革与服务相结合)共时性的实践,它突出强调了追

^①[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开放社会科学》,刘锋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03—108页。

求真理和知识,主张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突出知识服务社会,为富国富民而努力的使命感与责任感。我们纪念燕京大学开办社会工作一百周年,是尝试回顾历史,面向北京大学和中国社会工作发展的未来。北京大学社会工作专业教育的发展,既与强调追求真理和服务社会的燕京学派传统息息相关,也与新时代北京大学的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建设使命和服务国家发展战略需求紧密联系在一起。作为应用的社会学,北京大学社会工作的发展,始终在理论与实践相互促进进程中得以发展。^①同时,正如费孝通先生所指出的那样,社会学的发展应扩展传统的界限。而作为应用的社会学,中国社会工作不同于西方的社会工作,即要立于中国社会与中华文明基础上,将科学性与人文性有效地结合在一起。^②在一个全球化发展已久的时代里,知识发展与传播不再是局限在民族国家的疆域内,而是一种注重互惠共享的跨文化交流。在当下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和实现共同富裕,并迈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远大征程中,如同社会学一样,社会工作也面临建构自身的知识体系和方法,基于中国文化自身创造性地发展出服务社会和解决人的问题的各种理论与实践方法,而要做到这一点,将东西方知识与实践有效融合在一起,促进专业化和学科影响力提升的同时,有效地解决个人、家庭、社区和社会总体的各种问题,将个人困境与社会结构变化紧密联系在一起,避免误入个人化的专业实践谜团里。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强化实践的自觉。^③基于北京大学的历史传统与当代的使命,社会工作的发展要立志高远,密切理论与实践的联系,并力图从制度和政策变革出发,通过国家能力的提升与更广泛的社会动员与参与,实现和谐有序和共同富裕的美好社会目标。

[责任编辑:韩小凤]

①王思斌:《从“教育先行”到理论与实践的“互促性发展”》,《中国社会工作学刊》(第一辑),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19年版,第1—19页。

②《费孝通全集》(第十七卷),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38页。

③洪大用:《实践自觉与中国式现代化的社会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2021年第12期。